

敦煌写经永兴郡佛印考

李之檀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9)

内容摘要: 本文根据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杂阿毗昙心论卷十》敦煌写经所印朱文“永兴郡印”及敦煌地区历史地理沿革的考察, 认为此卷写经应诞生于北周武帝改晋昌郡为永兴郡后至下令禁佛期间(561-574)的敦煌地区, 而经卷背后的永兴郡捺印佛像版画, 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一幅版画作品。

关键词: 敦煌写经;《杂阿毗昙心论卷十》;永兴郡印;捺印佛像

中图分类号: K870.6; J2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0)03-0108-03

Investigation to the stamp of official seal of Yongxing County on Dunhuang Manuscript

LI Zhita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On Samyuktābhidharmahridaya Vol.10, a piece of Dunhuang Manuscript in Chinese National Library Collection, there is vermilion pigment seal read as Seal of Yongxing County astride seams. This article tries to figure out the origin of the scroll by a extensively survey o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records of Dunhuang, and put forwards opinion that dating of the scroll is around 561-574 A.D.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The engraved printing of the Buddhist figures on its back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the earliest printmaking production in the world.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 Samyuktābhidharmahridaya vo.10; Seal of Yongxing County; Print-making Buddhist figure

敦煌写经永兴郡佛印, 最早发表于 2000 年 6 月出版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一书^[1]。该书图版 6 为写经, 说明称: 杂阿毗昙心论卷十, 东晋(317—420)写本, 卷轴装, 首尾残, 长 135.1cm, 高 27.9cm。本卷背面有捺印佛像及永兴郡印。卷首有曾熙等人题跋及钤印(藏品编号 BD.14711)。

又该书图版 7 为郡印, “永兴郡印”钤印于《杂阿毗昙心论卷十》背, 长 5.4cm, 高 5.4cm(图版 34)。

又该书图版 8 为佛印, 说明称“墨捺印佛像, 捺印于《杂阿毗昙心论卷十》背, 高 14.5cm, 宽 11.8cm”(图版 35)。

《杂阿毗昙心论》原 11 卷, 或 16 卷, 又名《杂

收稿日期: 2009-05-04

作者简介: 李之檀(1933—), 男, 北京市人,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阿毘昙毘婆沙》，或《杂阿毘昙经》，或《杂心论》，尊者法救造，僧迦跋摩(Samgharman，亦称僧迦跋弥)译。僧迦跋摩为师子国沙门，公元478年前，曾译经于建业(今江苏南京)，后西行求法诸师^[2]。

印于敦煌写经背面的这幅捺印佛像，画面中央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有背光及头光，双手作说法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左右站立于莲花内的为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他们都是阿弥陀佛的胁侍。三尊统称为西方三圣。佛像的上方及左右各有梵文经咒两行，下方有梵文经咒四行，四周为由圆点纹组成的边框，内外共两行。由于捺印佛像高达14.5cm，虽其刻印颇似印章，但已可以明确地说，它已经是一件早期的版画作品了。在写经背面印佛的旁边，还盖印了朱文的“永兴郡印”，方形，长宽均为5.4cm。

这件敦煌写经图版的发表，受到了学术界尤其是从事印刷史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石云里先生在《新公开的敦煌南齐写本上的捺印佛像》一文中对其进行了研究^[3]。

石先生曾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展览”中，见到过这件写经的原件。这部写经为麻纸，纸厚0.09—0.15mm，全长135.1cm，经卷首尾残缺。其背面捺印有数幅佛像，从原件外观尤其是印品的墨色看，它们是以同一雕版，分数次着墨后捺印的，着墨一次，连续捺印3至4次，捺印的顺序是自左至右，其中的图形刻版线条精细均匀，极其流畅，反映出十分纯熟的雕刻技巧，佛像四周的梵文文字，字体虽小，但也刻制得非常细致老到。可惜由于捺印质量不高，其中多数梵文文字已经模糊不清。石云里先生对此写经产生的年代及地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写经背面多处盖有“永兴郡印”，据《南齐书》卷15载，永兴郡始置于南齐隆昌元年(494)，属宁州，在今云南境内。公元502年南齐灭亡后，这一建置未见延续。因此，该写本上的这些捺印佛像，应该是南齐时期的遗物。由此可知，捺印佛像的产生，至少可以推到5—6世纪。

我本人在编著《中国版画全集·佛教版画》一书时，见到了《敦煌遗书精品选》，后来也见到了石云里先生的文章，经过核查《南齐书》的原文，也将此写经背面的印佛作为中国最早的佛教版画编入此书的第一幅图版。同时，我也沿用了石云里先生

的观点，认为此写经及捺印佛像为南齐遗物，诞生于云南，后传入敦煌。并认为它把佛教捺印版画产生的历史，至少向前提早了100多年。

石云里先生的文章，引起我对这卷敦煌写经永兴郡印佛的高度重视。但随着时间的前进，总要对“南齐说”做更进一步的探讨。特别是我的同事孙机先生，他认为此写经应诞生于敦煌附近，提醒我要做更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于是我更进一步翻阅了《南齐书》卷15关于南齐建立永兴郡的记载。该书对永兴郡所在并被其管辖的宁州，有这样一段描述：

宁州，镇建宁郡，本益州南中，诸葛亮所谓不毛之地也，道远土瘠，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氏强族，恃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

这段文字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南齐时永兴郡的客观环境和氛围。刘宋时期，师子国沙门僧迦跋摩翻译成《杂阿毗昙心论》后，于公元478年由建业西行求法诸师，并未南行。此与公元494年至公元502年云南永兴郡的存在时间，只相隔20余年，此经译本是否会由译经的南京传到云南，并被重新抄写完毕，是一个很大的疑点。另外南齐时的永兴郡距离敦煌很远，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写经后来又如何由云南流动转移到敦煌，而后被发现于莫高窟藏经洞，更是一个难解之谜。

此后，我查阅了历史上关于永兴郡的文献，发现有关“永兴郡”的记载，并非只有《南齐书》一处。

如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40敦煌寿昌郡部分中记载，瓜州本汉酒泉郡，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分酒泉置敦煌郡。西晋惠帝时(290—306)又分二郡，置晋昌郡。后周武帝(561—578)改为永兴郡，隋开皇三年(583)罢郡。由此而知，北周时期酒泉敦煌一带的永兴郡，大约存在了20多年。

又如《太平寰宇记》卷153也记载，瓜州后周初称晋昌郡，后周武帝时改晋昌郡为永兴郡。隋初罢郡立瓜州，炀帝初又废瓜州，以其地并入敦煌。

甚至元代梁益《诗传旁通》卷5“国风·周南”，在解释周代先祖后稷被舜封之于“邠”时，仍称“邠”为永兴之武功。并且称永兴郡武功县西南的故邠城，有周代始祖后稷及其母姜嫄的祠堂。可知元朝人还称武功县属于原永兴郡。

根据以上文献，古代的瓜州即今酒泉敦煌一

带,于后周武帝至隋开皇三年存在“永兴郡”建置,长达20余年之久。而且直到元代建置虽然废除了,仍有人习惯于称旧建置,仍称“永兴郡”。

师子国沙门僧迦跋摩,在建业翻译此经后,由南京带至西北,后被敦煌人重新抄写而成这卷新的写经,极为合情合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杂阿毗昙心论卷十》这卷敦煌写经,包括经背后的“永兴郡印”和捺印佛像,极有可能就诞生在敦煌酒泉一带。而且这件遗物后来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这样流传有序,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我们不需要再去研究它是如何由遥远的云南,经过长途跋涉而来到敦煌了。

我们说永兴郡捺印佛像的诞生地,就在敦煌酒泉一带的瓜州,这个判断,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了,但还需要做更仔细的研究。

后周武帝时(561—578)敦煌莫高窟以及敦煌酒泉是处于什么情况之下呢?根据马世长先生整理的《敦煌莫高窟纪事》^[4],公元557年宇文觉登天王位,建立北周政权,敦煌归于北周。公元563年北周武帝保定三年,曾改称敦煌为鸣沙县,后设永兴郡。北周时期公元574年以前,建平公于义任瓜州刺史,在敦煌开凿“一大窟”。刻“永兴郡印”的永兴郡官员应是建平公于义的下属,和建平公一样信奉佛教,他手中拥有或自己亲笔写下这卷写经,然后盖上自己的官印,并在经背捺印上佛教版画,都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几乎同时,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宇文邕竟下令禁断佛道二教。公元577年又下诏废灭佛教,令僧尼还俗。在此期间,瓜州的阿育王寺、沙州的大乘寺都被毁废。这卷《杂阿毗昙心论》写经也经过历史的变迁,辗转收入敦煌莫高窟第17窟内封存。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藏经洞被发现,这部写经得以重见天日。

这些都说明这卷《杂阿毗昙心论卷十》写经是北周时诞生于今日的敦煌地区,并且在建窟与灭佛的尖锐矛盾和斗争中幸存下来的珍贵遗物。

也许有人会问,宋代的王应麟,在他编的类书《玉海》卷57中,提到唐贞观十七年太宗李世民诏图绘功臣于凌烟阁时,说24位功臣中包括“礼部尚书永兴郡公虞世南”,甚至在清雍正《陕西通志》卷73,以及乾隆《关中胜迹图志》卷6中,都还称明代时西安尚有“永兴郡王府”,那么敦煌写经《杂阿毗昙心论卷十》背面的“永兴郡印”,会不会与唐初重臣虞世南有关呢?其实如果仔细一点读《旧唐

书》与《新唐书》中的虞世南传,就会发现唐贞观六年虞世南的封爵是“永兴县子”,唐贞观八年又晋爵为“永兴县公”,而不是“永兴郡公”。“永兴郡公”只是唐代以后的人对虞世南封爵称号的习惯叫法,而不是虞世南生前的称号。《旧唐书》虞世南传还说他“性沉静寡欲,笃志勤学”,明明是晋爵为“永兴县公”,虞世南怎么会自己做主刻一个“永兴郡印”的印章呢?所以说“郡印”与“县公”虞世南有关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敦煌遗书精品选》图版6说明称BD.14711号写本《杂阿毗昙心论卷十》为东晋(317—420)时写经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公元478年前的刘宋僧迦跋摩才将此经翻译成汉文,东晋时怎么能有此经的汉文写经呢。另外说此写经诞生于南齐设永兴郡至南齐灭亡间(494—502)的云南,也疑点颇多,难以解释清楚,如前所述,无法成立。说此写经诞生于唐贞观八年虞世南晋爵“永兴县公”之后,更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只有公元561年北周武帝改晋昌郡为永兴郡后至公元574年下令禁佛的13年间,才是这部写经最精确的诞生时间,而且诞生于敦煌地区,才是最可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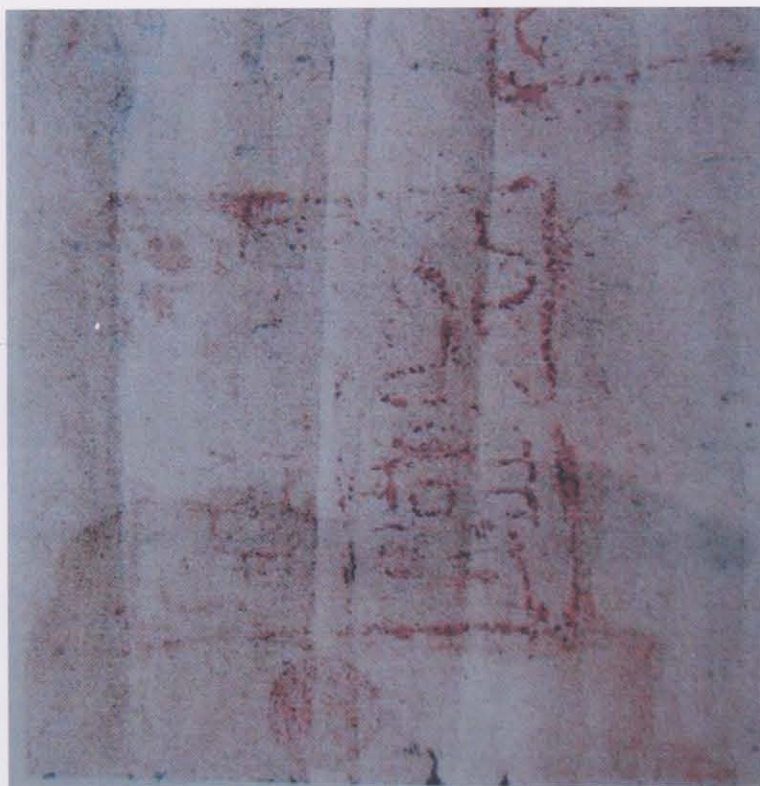
过去我们见到过的捺印佛像,都无明确纪年,或无旁证可考,多笼统地说是唐五代时所刻,谁也无法明确指出究竟哪一件是唐代刻的,更无法提供可靠的依据。而这卷《杂阿毗昙心论卷十》背后的印佛版画,却可以明确地说诞生于北周的公元561至574年间。这比在文献中记载的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西行取经回国后印普贤像,至少要早139年。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卷写经背后的捺印佛教版画,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一幅版画作品。它和公元868年诞生的有咸通九年明确纪年的《金刚经扉画·佛在祇树给孤独园讲经图》版画一样,闪耀着中华文明耀眼的光辉。

参考文献:

- [1] 李际宁,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M].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2000.
- [2] 冯承钧,编.历代求法翻经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 [3] 石云里.新公开的敦煌南齐写本上的捺印佛像[J].中国印刷,2000(10):64-65.
- [4] 马世长.敦煌莫高窟纪事[M]//王伯敏,编.中国美术通史:第8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图版 33 II 98DX1②: 1



图版 34 BD.14711 背 永兴郡印



图版 35 BD.14711 背 捺印佛像